

# 增訂版序

本書為拙著《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的增訂版，新增五章，分別為第三章〈近代中日兩國的民族西來說——單一民族國家與悠久輝煌的民族史〉、第五章〈「中華民族論」與「日本民族論」——單一民族國家思想中的血緣民族論〉、第七章〈民族主義與一黨獨裁——留日政治家的日本觀與十月革命的認識〉、第九章〈「邊緣人」的歷史與歷史書寫——兩個「民族國家」夾縫中的日本華僑華人〉、第十二章〈從「閩南民族」說到「回教圈」——在「單一民族國家」之外發現共同體〉。

由於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加之歷代政權為了渡過各種危機而不時利用民族主義，使許多中國人至今視日本為「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敵。但是必須承認的是，從宏觀來看，對於近代中國來說，日本事實上扮演了亦師、亦友、亦敵的三重角色；而在造成兩國激烈衝突之根源和成為具體表現形式的民族主義的層次上，則更能夠讓人感受到這種複雜的關係。

民族主義就是一種以民族、或企圖以民族為中心建立政治秩序的思想或主張。這一性質在近代中國表現得尤為明顯，1924年孫中山在其《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中開門見山地談到：在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sup>1</sup>也就是說，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是為

了建設一個「中華民族國家」而被發明出來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鼓吹天下主義的儒家思想在歷史上一直是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和統治正當性的思想根據，民族主義原本最無可能在近代中國站住腳跟，然而事實卻是民族主義戰勝了天下主義，主導了中國的近代歷史，這無疑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個巨大的拐點。然而，之所以選擇了民族主義並開始出現「中華民族」=「國族」的思想，比起當時中國的內部狀況所起的推動作用來，更主要的原因則是從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方面都具備了充分的條件，足以讓中國人以推崇單一民族國家形式的日本為師。

所謂「天時」就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並且以此為基礎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兩次戰爭中取得了巨大的勝利，而1898年清政府的百日維新卻以失敗告終；所謂「地利」就是日本與中國一海之隔，且由於日本使用漢字，兩國之間的信息傳遞和相互交通都較歐美各國便利；所謂「人和」就是在上述天時和地利的基礎上，大量留學生和思想家聚集到日本，認真總結近代日本成功的秘訣和積極探索近代中國發展的道路。而在近代日本的這個場域中，中國的思想家們看到和學到的就是如何建構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其最具體的成果就是「中華民族」=「國族」思想的誕生。

近代的「民族」概念，是在十九世紀末由日本傳入中國的。<sup>2</sup>梁啟超在其《新民說》中曾經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當年在北京見到日本駐清國公使矢野文雄（號龍溪），他引黃遵憲《日本國志》所記來議論日本，結果被對方斥為「無異於據明史以言今日中國之時局」，因為「黃書成於明治十四年，我國自維新以來，每十年間之進步，雖前此百年不如也，然則二十年之書，非明史之類如何？」梁啟超當時對此頗不以為然，然而1898年流亡到日本後，「東遊以來，證以所見，良信。……夫同在東亞之地，同為黃族之民，而何一進一不進，霄壤若此。」<sup>3</sup>近代日本的飛速進步從精神和思想上給梁啟超帶來了巨大的震撼，促使他去探求近代日本之所以實現了高速發展的秘密，

而在這裏被他發現的就是民族主義。1901年9月，梁啟超在其〈中國史敘論〉中提出了「中國民族」的概念，一般認為，也是梁啟超1902年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首次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國家觀衍為法家，世界觀衍為陰陽家。」<sup>4</sup>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從上下文來看，它指的就是漢族。」<sup>5</sup>這一判斷無疑是正確的。

事實上，以漢字形式出現的「中華民族」的性質是非常清楚的：一個居住在中原、中土、中國這一地域上（「中」），具有農業文明的傳統（「華」），具有來自於同一個父系祖先的共同血統血緣關係（「族」）的人類集團（「民」）。地緣（中）、文化（華）和血統血緣（族）三元素作為中華民族的結合原理，這一點是無法改變的，這是由它所使用的漢字的意義所決定的。換言之，由於使用了表意的漢字來表示，「中華民族」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只能是「漢族」的另一個代名詞。因此，即使日後「中華民族」被擴大解釋為包括少數民族集團的所有國民，也無法讓少數民族消除自己受到歧視的印象，而追究其根本原因，首先是使用漢字的漢人自身受到了「中華民族」一詞所直接傳遞出來的地域、文化、尤其是血統血緣符號的影響，而無法消除「漢族才是正統國民」的思想。近代中國盛行的漢奸論，就是其明證。<sup>6</sup>

必須看到的是，以地域、文化與血統血緣三元素為其結合原理的「中華民族」，與近代國際社會所理解的「民族」的性質有著明顯的不同。斯大林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提出了他著名的民族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sup>7</sup>近代西方的人類學界和歷史學界也對「民族」的內涵進行了大量探討，筆者恩師山內昌之先生總結出「民族」具有客觀的標準和主觀的標準：從客觀上來說，民族就是一個具有共同名稱和共通文化，

具有一個可以用來說明共通起源的神話，即共通歷史記憶的人類集團；而從主觀上來說，民族就是在一定的領域中具有共同連帶意識的集團。<sup>8</sup> 在他們的思想中，血統和血緣都沒有成為將人們結合為「民族」共同體的必要條件。換言之，強調血統、血緣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元素，是近代中國的「中華民族論」的一個重要特點。所以從實質上來說，中華民族論就是一種血統論的民族論，或者說，就是一個種族論。

與文化、使用語言、經濟方式、生活地域等元素相比，血統血緣的元素不僅無法被人為改變，且其外部特徵又是可視的。「中華民族」之所以被賦予如此具體而明顯的表徵，就是因為它是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家們為了讓人們更容易認清同類和區別他者而發明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為了區別他者而發明出來的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家的中華民族話語中，民族是與國家連在一起的。例如，陶成章在其著作《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中寫道：「中國民族者，一名漢族，其自曰中華人，又曰中國人。」<sup>9</sup> 章太炎在其〈中華民國解〉中強調：「建漢名以族，而邦國之意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諡。」<sup>10</sup> 就是說，只有「漢族」才是「中華」，才是「中國人」。「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我同胞皆須自認自己的漢種，中國人之中國」，種族論的中華民族論話語的目標非常清楚，就是通過主張證明作為一個種族的漢人才是中國國家的主人，達到「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不許異種人沾染我中國絲毫權利」的目的。<sup>11</sup>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章太炎強調民族必須具有血統血緣的元素，甚至否定了從文化的角度認識「中華」的傳統，而把血統說成是共同文化的基礎：「縱今華有文化之義，豈得曰凡有文化者，盡為中國人乎。」「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統而起。」<sup>12</sup> 孫中山更是大力強調血緣血統在人們結合為一個民族集團問題上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可結合成一個民族」的「自然力」有五種，而在其中「最大的力是『血

統』」。孫中山的這個判斷是以他對國家性質的解釋為基礎的：「一個團體由於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是民族，由於霸道人為力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sup>13</sup> 也就是說，孫中山設計了這樣一套理論邏輯：人類只是在具有了共同的血統血緣關係的基礎上才會自然產生愛心，所以只有在以血統血緣關係為根據而形成的「民族」的團體內，才能出現王道政治。因此，只有按照民族的單位來組織國家，這個國家才能夠出現王道政治。

很明顯，孫中山對共同血統血緣關係的強調，其根本的目的並不在於剖析民族的性質，他是要通過說明清王朝政府不可能對不同種族的「漢」族產生仁愛之心，證明清王朝沒有統治「中國」的正當性，而打倒清王朝為目標的民族革命才是正當的。這種血統血緣關係決定是否出現王道政治、因而是否具備統治正當性的主張，就是近代中國建構「國族」主義的理論根據：「歷史者何？敘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也，捨人種則無歷史。何以故？歷史生於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於內焉有所結，於外焉有所排，是即種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sup>14</sup> 梁啟超早在1902年的《新史學》中提出的這段論述，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家中最早直接提出「國族」的論述之一。從孫中山對血統與「王道自然力」之間關係的解釋即可以看出，其後各種關於「國族」的論述，事實上都沒有能夠徹底脫離當年梁啟超留下的血緣民族論的軌跡。<sup>15</sup>

二十世紀初的近代中國思想家們之所以能夠注意到共同的血統血緣關係在強調統治正當性上的作用，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國族」的主張，無疑是受到了近代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啟發。日本建設近代國家的方法，就是形塑一個國民在地理、文化、血緣上高度重合的共同體，其中最受到重視的就是共同的血統血緣關係。以國體論的興起為標誌，在清國留學生開始來到日本之前的十九世紀末期，以血緣民族論為基礎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已經成為日本思

想界的主流。例如，曾經留學德國六年（1884—1890）、後官至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校長的井上哲次郎，1898年就在其《敕語衍義》增訂版中寫到：「日本民族為具有同一古代傳說系譜，建國以來就居住在同一國土上，具有同一的語言、習慣、風俗、歷史，從未被其他民族所征服過的，盤踞於蜻蜓洲首尾的一大血族。」<sup>16</sup>關於近代日本的思想家把「日本民族」視為「血族」的例子，在本書增訂部分多有提及。

孫中山就曾多次表露出對日本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推崇：「我們東方有個島國，可以說是東方的英國，這個國家就是日本，日本國也是一個民族造成的，他們的民族，叫做『大和』民族。自開國到現在，沒有受過外力的吞併，雖然以元朝蒙古的強盛，還沒有征服過他……」<sup>17</sup>他甚至主張，自己關於「國族」須以「宗族」為基礎形成的思想也是受到了日本的啟發：「從前日本用藩閥諸侯的關係，聯絡成了大和民族。當時日本要用藩閥諸侯那些關係的原因，和我主張聯成中國民族，要用宗族的關係也是一樣。」<sup>18</sup>中華民族要由宗族為基礎而形成，我們知道，蔣介石甚至在抗日戰爭時期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也沿用了孫中山的這一血緣民族論的主張。梁啟超、陶成章、劉師培等許多身處於二十世紀初的日本這一誕生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之場域中的民族主義思想家們，對日本單一民族國家思想所發出的由衷讚許之例，更是不勝枚舉。近代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建立在血緣民族論的基礎之上，他們的這些讚許都是在清楚地認識到了這種性質之後才發出的。關於這一點，本書增訂章節部分有更加詳細的分析。

應該指出的是，雖然「中華民族」就是「日本民族」、中國的「國族」思想就是日本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翻版，但是這種對血統血緣論民族主義的嚮往和學習，最初卻完全是出於為反清活動尋找正當性、煽動漢人的民眾產生反清情緒的目的。所以由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家們自願進行的對日本民族主義的學習及其在中國的實踐，還具有著以日本為友的性質。事實上，近代中國的民族革命大

本營——同盟會從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幫助和支持。關於這一點，可以從孫中山何以直到他生命晚期的1924年11月仍然要親自到日本，向日本社會大聲呼喚「大亞洲主義」，並在此時再次見到日本黑龍會的精神領袖頭山滿一事得到印證。本書增訂部分也談到了這些事實。

然而，當孫中山等人將他們發動反清活動的正當性與「民族」連在一起時，就使他們的活動產生了與發生在中國歷史上的「革命」所不同的性質。那麼他們如何能夠讓人們承認其「民族革命」的正當性呢？關於這一點，孫中山其實已經有所總結，這就是通過幫助漢人發現統治著他們的其實是不同的種族，明白自己因與統治者種族不同而處於「極危險的地步」，而同情、理解和支持「民族革命」：「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我們想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是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既然知道了處於很危險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鬥，無論我們民族是處於甚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sup>19</sup>

孫中山等民族主義思想家們通過「滿清」對「中華民族」、「漢族」的欺壓，強調「極危險的地位」：「中華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也，亦世界之至優者也，中華土地，世界之至廣者也，亦世界之至富者也。然而以此至大至優之民族，……在滿清之世，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是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淨盡；至二百六十餘年之久，種族不至滅絕，亦云幸矣。」<sup>20</sup>「照進化論中的天然公例說，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優者勝，劣者敗。我們的民族到底是優者呢？或是劣者呢？是適者呢？或是不適者呢？」<sup>21</sup>

發表於1901年的〈亡國篇〉中，已經出現了「漢族」一詞：「皇皇種族，乃使之永遠沉淪，其非人心哉！……夫駐防云者，則豈不以防我漢族哉！」<sup>22</sup>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據推測是由秦力山執筆的文

章，已經將「亡國」與「種族」的沉淪連在一起。孫中山曾經就民族主義的功能發問：「何以外國亡國，民族主義不至於亡。為甚麼中國經過了兩度亡國，民族思想就滅亡了呢？」<sup>23</sup>由此可以知道，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此後之所以能夠向漢族社會迅速滲透，並且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應該與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家從「亡國」和「滅種」兩個層次上強化受害者意識有關。

1905年，汪精衛指出：「以一王室僕一王室謂之易姓，以一國家踣一國家謂之亡國，以一種族克一種族謂之滅種。彼滿洲者對於明朝，則為易姓，而對於中國，對於我民族，則實為亡國滅種之寇仇，……彼其利用儒術，摭拾一二尊君親上之語，欲以摧陷廓清華夷之大防，以斬我民族死心歸化，罔敢有越志。」<sup>24</sup>也就是說，亡種就是不能在文化上保持民族的獨立性，因此喪失了（區別於統治者的）民族意識。滅種是比亡國令漢人更加難以接受的事情，章太炎在其〈中華民國解〉中即稱：文化的同化一般指作為被統治者的民族集團向統治民族集團同化，而漢向滿的同化，因為主導權不在漢，故無異於一種「以寇之道，而據我寢宮入我床第」的強姦行為。<sup>25</sup>由章太炎的思想可以看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之所以能夠讓漢人的民眾所接受，是與通過對歷史文明的比較，製造出文明水平高的「漢族」遭到了文明程度低的野蠻民族集團侵害的話語，從而強化了漢人的受害者意識所分不開的。「支那之亡也，以四千年神明之胄，亡於彼游牧水草之民，既為世界歷史中所僅見」，<sup>26</sup>民族的敵視中包含著文化上的歧視，也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

孫中山更是直言，失去了民族意識就是亡種，並主張漢人滅種的原因在於中國實行了天下主義：「究竟世界主義是好是不好呢？如果這個主義是好的，為甚麼中國一經亡國，民族主義就要消滅呢？世界主義，就是中國二千多年以前所講的天下主義。……（滿清入關）拿十萬人怎麼能夠征服數萬萬人呢？因為那時候，中國大多數人很提倡世界主義，不講民族主義，無論甚麼人來做中國皇帝，都是歡

迎的。」<sup>27</sup>把「亡國」轉化為「滅種」的問題進行解讀，無疑加倍強化了漢人的被害者意識，因而使得他們更願意認同和接受民族主義。這一點可以從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遇到國內或國際政治問題時，都會被人轉換到民族主義的視野中進行解讀的習慣上得到證實。

人類之所以產生被害者意識，就是因為從本質上來說，被害者意識是一個把失敗的責任推給他者、從而把自己的行為進行正當化的論理。因此，建立在被害者心理基礎上的民族主義也具有強烈的號召力和堅強的生命力，這也是近代以來民族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各個政權的正當性資源的重要原因。但是孫中山注意到，被害者意識固然能夠促使漢人理解和接受民族主義的思想，然而要將它轉化成一種主動的、積極的行動，卻是要以「敵人」的具體存在為前提的：「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有兩種：頭一種是要令四萬萬人皆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是生死關頭，在這個生死關頭須要避禍求福，避死求生。要怎麼能夠避禍求福、避死求生呢？……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又說：『多難可以興邦』，這兩句話完全是心理作用。譬如就頭一句話說，所謂無敵國外患，是自己心理上覺得沒有外患，自以為很安全，是世界中最強大的國家，外人不敵來侵犯，可以不必講國防，所以一遇有外患，便至亡國。……我們要恢復民族主義，就要自己心理中知道現在中國是多難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時代，那末已經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才可以圖恢復。」<sup>28</sup>哪怕是一個假想敵，鼓舞民族主義情緒一定需要一個敵人，要想取得效果，這個敵人必須更加逼真。在這一點上，孫中山無疑是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啟發。<sup>29</sup>只有在敵人大兵壓境之時，人們才會開始確認敵我之間共同體領域和邊界，只有處於恐懼和精神緊張中，感覺到只有背水一戰的人們，才會進入一種亢奮忘我、從而容易被誘導的狀態。

當「民族革命」成功之後，由於已經深得漢人的民心，民族主義又變成了近代中國歷代政權主張其統治正當性的最主要工具。然而

為了繼續製造危機狀態，就需要找到能夠替代「滿清」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實為「漢族民族主義」所必須的假想敵。這時，除了國內追求獨立的其他民族集團之外，國際社會中的「各國」「列強」就成為了目標。這種思想脈絡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一書中表現得尤為清晰：「中國退化到現在地位的原因，是由於失去了民族精神，所以我們民族被別種民族征服，統治了兩百多年。從前做滿洲人的奴隸，現在做各國人的奴隸。現在做各國人的奴隸，所受的痛苦，比從前還要更甚。」<sup>30</sup>「（中國）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sup>31</sup>

在孫中山的筆下，幾乎所有近代化程度高的國家都成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假想敵，而日本也赫然名列其中：「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是日本。……日本近在東鄰，他們的陸海軍隨時可以長驅直入。日本或者因為時機未至，暫不動手，如果要動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國。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止，最多不過十天；所以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洋東岸，最強的是美國。……再從美國更向東望，位於歐洲大陸與大西洋之間的便是英倫三島。……再來望到歐洲大陸，現在最強的是法國。」<sup>32</sup>儘管相近相接當年可以成為中國以日本為師的地利，但是由於中國是在向同樣提倡民族主義的近代日本學習近代民族主義，所以這種地理條件也會讓中日兩國變為敵對的關係。在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道路上，日本注定會由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師、之友衍變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敵，孫中山當年也許已經意識到這個結局。

因為近代中國以近代日本為榜樣學習民族主義，所以就決定了近代日本對於中國來說只能是亦師、亦友、亦敵的關係。此次對拙著進行增訂並重新組織，就是為了從多個角度和層面進一步深入探

討分析這個問題。增訂版在結構上仍是三個部分。第一部「以日本為師」包括從第一章至第五章，探討近代中國在以日本為師的過程中，為甚麼最終選擇了以近代日本的血緣民族論和單一民族國家形式建設中國近代國家的問題。第二部「『民族國家』的迷惘」包括從第六章至第九章，討論近代中國所發生的一系列問題與從日本所學習到的血緣民族論和單一民族國家思想之間的關係。第三部「日本民族主義視野下的中國民族主義與民族問題」包括從第十章至第十四章，探討作為發明了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近代日本在自身民族主義目的的驅動下，是如何利用不顧多民族共同體的傳統但卻追求單一民族國家形式的民族主義，給近代中國帶來的問題，如何通過煽動受害者心理和發明新的共同體思想而衝破日本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束縛，為其侵略中國進行正當化等問題。所增寫的五章中，第九章〈「邊緣人」的歷史與歷史書寫——兩個「民族國家」夾縫中的日本華僑華人〉曾發表於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海外華人研究》第1期（2017年12月，第43–62頁），第七章〈民族主義與一黨獨裁——留日政治家的日本觀與十月革命的認識〉之一部分曾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總第163期（2017年10月，第58–72頁），第十二章〈從「圖蘭民族」說到「回教圈」——在「單一民族國家」之外發現共同體〉之一部分曾分別發表於《二十一世紀》總第154期（2016年4月，第61–78頁）和中華民國國史館《國史研究通訊》第10期（2016年6月，第52–63頁）。

在此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深深致謝，是甘琦社長對學術研究一如既往的熱忱和對筆者的信賴，才有此次增訂版出版的機會；再次感謝敏聰編輯，因為他對我的每一本書以如此精美的面孔問世，都極為認真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18年12月15日

於六甲山下受災後修復完工一週後的陋舍

## 註釋

- 1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第185頁。
- 2 王柯：〈「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二十一世紀》，總第77期（2004年6月），第73–83頁。增訂版刊載於《民族學與社會學通訊》，第70期（中國社會學會民族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2010），第1–12頁。
- 3 梁啟超：《新民說》，載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北京：三聯書店，1960），第144–145頁。
- 4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載吳松、龐雲昆、王文光、段炳昌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第1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228頁。原文發表於1902年3–12月，《新民》，第3、5、7、9、12、16、18、21、22各期。
- 5 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第66頁。
- 6 王柯：〈「漢奸」考〉，岩波書店《思想》，第981期（2006年1月），第28–47頁。
- 7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頁。該文原發表於1913年《啟蒙》雜誌第3–5期，名為〈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
- 8 山內昌之：「民族」，《政治學事典》（東京：弘文堂，2000），第1062–1063頁。
- 9 陶成章：《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載湯志鈞編：《陶成章集》（中華書局，1986），第134頁。
- 10 章太炎：〈中華民國解〉，《民報》，第15期（1907年7月），載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下（北京：三聯書店，1963），第737頁。
- 11 鄒容：《革命軍》，第六章〈革命獨立之大義〉（1903），載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北京：三聯書店，1960），第675頁。
- 12 章太炎：〈中華民國解〉。
- 13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第186–187頁。
- 14 梁啟超：《新史學》，載《飲冰室文集點校》，第3集，第1634頁。
- 15 例如楊瑞松就曾指出，1903年鄒容《革命軍》第四章〈革命必剖清人種〉

中的國族論述，就是「原封不動地抄自於梁啟超的」。楊瑞松：〈打造共同體的新仇舊恨：鄒容國族論述中的「他者建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12年5月），第49–50頁；鄒容原文見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第668頁。

- 16 井上哲次郎：《敕語衍義》增訂版（東京：敬業社，1898），第165–166頁，此處參照了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第52頁。
- 17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第189頁。
- 18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五講，第240頁。
- 19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第242頁。
- 20 孫中山：《民權初步》，「社會建設」序（1917年2月1日），《國父全書》（台北：國防研究院，1960），第118頁。
- 21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三講，第217–218頁。
- 22 秦力山：〈亡國篇〉，《國民報》，第4期（1901年8月10日），載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第91頁。另見彭國興、劉晴波編：《秦力山集》（中華書局，1987）。
- 23 同上註，第215頁。
- 24 汪精衛：〈民族的國民〉（1905年10月），載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上（北京：三聯書店，1963），第94頁。
- 25 章太炎：〈中華民國解〉。
- 26 秦力山：〈中國滅亡論〉，《國民報》，第2、3、4期（1901年6月10日、7月10日、8月10日），載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第89頁。
- 27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三講，第216頁。
- 28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五講，第231–232頁。
- 29 原文出自《孟子》〈告子〉下：「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 30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五講，第232頁。
- 31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第188–189頁。
- 32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五講，第233–234頁。